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7 年博士文库系列

伦理视角下的 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

A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彭萍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7 年博士文库系列

伦理视角下的 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

A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彭萍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 / 彭萍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9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07 年博士文库系列)

ISBN 978-7-5600-7824-3

I. 伦… II. 彭…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中国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5383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孙 丹

封面设计: 袁 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爱丽龙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824-3

定 价: 32.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8240001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中国文化学派的兴起

——序彭萍博士论著《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

辜正坤

彭萍博士的论著《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行将出版，这在中国翻译理论界，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因为这部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从伦理角度来审视中国传统翻译活动模式的理论专著，用填补空白这样的话来描述它，是恰如其分的。从另外一个角度，例如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角度来看，这部书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著作。

近 100 年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翻译研究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三大流派：1) 翻译研究的文学学派；2)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3)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彭萍博士的论著主要从伦理道德规范方面来探讨、研究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显然和翻译理论的文学学派和语言学派的理路大不相同，所以我将之归于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不过这一归类就引出对中国、乃至国际翻译研究文化学派与其他各派关系的评价问题。

从理论上说来，这三派对于翻译研究各自具有独特的贡献，理应并存，各擅其长，各得其所，相辅相成，互动互补，使整个翻译界和翻译理论研究辉煌壮大。但是，目前中国翻译界关于三派的关系尚未有统一的认识，难免有各自为阵、相互轻视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形成，受外来影响，尤其是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颇大，不可不加以分析。西方翻译理论在 20 世纪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很可观的成就，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翻译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成果也是应该的，值得鼓励、提倡的。但是借鉴不能成为生吞活剥，引进不可成为引狼入室，乃至使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完全受西方翻译理论模式所左右。

一、对翻译研究的文学学派的评价

从世界翻译研究历史来看，文学学派的历史未必最为悠久，但阵容肯定是最庞大的，取得的成就也相当突出。这大概因为文学作品的翻译量通常比其他学科的作品翻译量要大许多；译者多，故评者也多。中外的许多作家、诗人，往往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涉足翻译，并且或多或少地评论过翻译。例如古罗马的西赛罗从修辞学家与演说家的角度将翻译区分为解说式翻译与演说式翻译。昆体良提出“与原作竞争”的观点而哲罗姆提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观点。又例如中国近代现代的林纾、鲁迅、郭沫若、茅盾、徐志摩、曹禺、卞之琳等，都身兼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并且对翻译本身发表了许多珍贵的见解。所以文学学派的研究成果在量上确实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不过翻译研究的文学学派也有其不足之处，即感发印象式的、情绪性的论证方式有时颇为盛行，在这方面，语言学派的兴起可说是恰逢其时地弥补了这一缺陷。

二、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的评价

语言学研究、尤其是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尽管在 19 世纪就已经结出硕果，但是语言研究方法对其他学科的重大影响是在 20 世纪才在西方学术研究界渐次显露出锋芒的。哲学、人类学、文学、伦理学、神话学……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语言研究方法的烙印，有的学者甚至把 20 世纪称为语言分析的世纪。“语言学导向”(Linguistic Turn) 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学术话语。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会在 20 世纪的西方成为宠儿是情理中事。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往往具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所以语言学派研究者往往觉得自己底气十足，因而不可避免地强调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将翻译研究建构成一种科学，成为这派学人的理想。客观地说，西方翻译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理论成就

足以傲立世界翻译论坛。中国翻译界在这方面的成果尚难以和西人比肩。虽然中国翻译界的研究在借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进行纯理论研究方面做得不够，但在具体的翻译语言现象方面的研究却又是颇有建树的。例如对汉语翻译技巧（尤其是英汉语翻译技巧）方面的分析、梳理、归类、综合方面，可谓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清末民初时的一些学者曾断言，翻译作为一门艺术是不可教的，而现在能够进行翻译技能教学的教师已经数以千计了，原因是这方面的专门教材在质的方面已经走向成熟，在量的方面也已经是书满为患了。

三、对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评价

对文化学派的产生和评价，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有趣议题。我这里将要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会使中西翻译理论界的同人在最初都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只要认真读我的文章，我想我们是可以找到共识的。

1. 对“转向”提法的批判

在当代学术界，尤其在西方学术界，往往盛行某某学术研究或某某学科“转向”的提法。我以为这种提法本身至少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很值得商榷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千百万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资料、研究结论，往往千奇百怪，很难以一个方向去规范，更不宜假定某一个方向是最正确、最好的。而“转向”的提法就暗示、预设了一个前提：前此的研究方向是错误的或不好的，现在这个所谓的新方向才是唯一的、最好的研究方向。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反问的是：说一个学科、或学术研究领域“转向”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是权威的个人、媒介、学术机构，还是大众舆论？我们只要理智地考察一下这些依据，就会发现

它们其实都不足以为“转向”这种提法提供充分的理由。个人无论多么权威，都不可能使整个学科、或学术领域“转向”。何况个人的研究无论如何权威也无法囊括一门学科里的一切研究课题。同理，某个个人的研究只可能在一门学科的某个、或某几个课题上成为权威，不可能在该学科的一切课题上都成为权威。因此，依据某个人的单个或几个权威性成果就抛出某学科或某领域整体“转向”的提法是荒唐的。媒介在这里主要指出版社和专门的学术报刊。它们的出版物或许在某一学术领域引起了轰动，相似的研究性专著或文章也许相应增加，但是是否其总数已经多到可以断言整个学科都已经“转向”，却从来不见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及方向性不可能简单地以发表类似著作的数量的多寡来盖棺论定。在学术研究上常常有曲高和寡的现象，某些尖端课题也许只有很少的文章发表数量。不能以此来论定此课题只能随所谓学术大流而“转向”。有的专门的学术机构确实拥有左右学术风气力量，但这种力量要么是借助于意识形态的威力，要么是滥用其学术导向权威而产生的恶果。学术权威机构不应该人为地干扰一个学科内林林总总的学术研究课题，而应该只是为它们提供方便，使它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地得到鉴定与支持。它诚然可以强化某个课题的研究力量，以便预期产生更大的研究成果，如果因此妄言或妄图使整个研究领域在全国、全世界的范围内“转向”，则是可笑的。大众舆论只能解决大众性的问题，对于学术性研究、尤其是高端的学术研究，大众舆论在大多数的场合是没有用的；有时其作用可能还适得其反。

因此，动辄使用“转向”这个用语来定性整个学科的发展态势，是不科学、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这种提法在骨子里反映了一些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或崇拜西方的学者）的学术霸权导向意识，或者说学术垄断意识。通过这样的提法，野心勃勃的学者暗示，某学科过去的理论已经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它们被无情地颠覆

了。用这样的方法来打击自己在理论研究领域的对手，是某些学者的病态策略，我们应该加以鄙弃。当然，许多中国学者也使用了这样的用语，他们并非是故意捣乱，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往往是习惯性或盲目地跟风所导致的，这不是此文批判的对象，这点需要加以说明。

2. 多向并存论——界定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话语

如果说某一种学术研究学科或领域“转向”的提法不妥当，那么，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学术用语来对整体学科的研究方向加以描述或界定呢？

不容讳认，在一门学科之内，某些研究课题或某些研究方向或许是这门学科内的强项或成就最突出者。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客观地界定其成就所属的范围，充分肯定其贡献、地位和意义，但不能用这种成就来排斥、挟裹其他课题，造成似乎所有的课题都“转向”了的虚假印象。

在我看来，界定学术研究方向的正确话语应该采用多向并存论。一个学科就像一棵树，它的枝条象征着若干研究方向。由于许多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变化，某些研究方向在此时得到强调，它们发展得更强劲，代表了重要的方向，但并未使所有的枝条“转向”。同理，另一些研究方向也许在某些时间内相对受到忽视，发展得缓慢了一些，枝条相对不那么繁茂，但仍然在总的方面保有着从前的基本方向，没有也不必非要“转向”。在现实中，许多研究者常常在许多年内沉浸在自己的研究方向里，他们也许没有受到学术界的注目，但是并不能断言他们的研究已经“转向”。如果就研究者的数目而言，执着于传统研究方法的学者常常在人数上多于标新立异的学者，因此，说少数标新立异者的研究使得整个学术研究领域“转向”也是错误的，只应该说这部分学者的研究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或强化了某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可以得到强调，但它不能

替代其他方向，而应该与所有其他的研究方向共存。这就是我所谓的多向并存论。显然，这和我多年来主张的翻译多元互补论、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翻译理论多元互补论是完全一脉相承的。仍用前面的树枝作喻，则这种学术研究多向并存论可以简单地描述、比喻为：壮枝细枝共在，长枝短枝共存，旧枝新枝同见，花枝叶枝同昌。换一个角度，我们应该欢迎多枝花叶共生、共发、共荣、互补、互构、互进。这和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并而不融的思想相通。只有当所有的研究方向所代表的研究课题各司其职、各显神通、长短互补、克弊兴利，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人类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地、多向地、全面地兴旺发达，而不是单向地你方唱罢我登台式的流线型、对接型地狭隘发展。

3. 翻译研究何曾“转向”？

同理，翻译研究亦何曾转向？显而易见，近百年来，上述三大流派的翻译研究其实在各个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它们各自按各自的方向发展，只是发展的程度有别，并未真正转向。许多作翻译文本比较和翻译技巧研究的学者仍然一如既往地做这样的研究，也可以做这样的研究。许多用外国语言学理论诠释翻译现象的学者也仍然在做这样的研究，也可以做这样的研究。许多从文化学派的视野来探讨翻译问题的学者也理所当然地做着这样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兴趣也许错综复杂地换来换去，甚至单独或交织地应用文学学派、语言学派、或文化学派的研究方法来搞自己的翻译研究，但是，这三大类（或更多类）的研究方法本身并未转向，也无须转向。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研究领域多出了一些研究方向，从而丰富了这个研究领域，但硬要说多出来的方向便代表整个翻译研究方向，并狂妄地要整个翻译研究“转向”，这就滑稽而且荒唐了。

实际上，“转向”的提法主要是西方人喜欢的学术魔方，中国人自古是喜欢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有诸子百家共存共

荣的传统。即便在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代，其他各种学术派别受到某种贬抑，也是允许存在的，只不过不容易在政治上、在朝廷中获得重用而已。在近现代的相当多的学术领域，例如在翻译研究领域，西方人像耍魔术似的转着圈子玩。许多学者在后面乖乖地、盲目地、汗流浹背地追着转，花了老大的力气终于记熟了几个洋话语，眼巴巴地看着快赶上趟接轨了（国际的！），可以对话了（全球的！），可是就在对话接轨的当口，人家滴溜溜地又转向了，这次不兴“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来了个相反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回去，叫做“翻译转向”。可以预见，中国学者顺着原来的文化转向惯性，一个跟头栽出去，估摸着还要折腾三五年，才能克服惯性，回头再来摸索翻译转向，谁知道那时翻译转向又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很惭愧，觉得这些话说得太刻薄，因为西方人的研究路向，并非毫无道理。我也不是完全反对西方的理论取向。我的意思是，中国人不能老跟在别人背后转，而应该更多地承继自己的翻译理论传统，有限借鉴西式理论，更多地自主创新。所谓自主创新，意味着以我为主、兼擅他者之长的创新。如果一切全按别人的路子走，自己就成了机器、成了学舌的鹦鹉、成了耍猴人用绳子牵着的猴子，不管蹦跳得多么欢，终究是在照主人的指令行动。

四、所谓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纪略

目前在国际翻译学界和中国翻译学界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认识，即近现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首先发生在西方，之后扩展到其他的非西方国家。翻开现今在西方或中国出版的任何一种介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著作或文章，我们通常都会发现下述的种种说法。

在 6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领域基本上为传统的语言学派所垄断。但是从 60 年代开始，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相继发表的著作侧重审视文化内涵，标志着文化学的兴起。到了 70 年代，以佐哈尔和图里为代表的以色列学者提出了多系统论，把文学作品看

作是“社会、文化、文学和历史整体框架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被认为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成为文化转向的萌芽。但是，目前中外学者就所谓翻译的文化转向问题引述得最多的是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两位学者的理论，并断言他们在1990年明确提出了所谓的翻译的“文化转向”概念。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由于文化翻译学派的产生，翻译研究于是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研究，换言之，不是将翻译研究专注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对比、转换，而是把翻译和翻译现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广泛地联系起来。学者们相信，由于巴斯内特等关注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力图理解操纵文本的复杂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是什么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的策略，文本可能以怎样的方式为目的语系统接受，因此翻译研究从此拉开了文化转向的序幕。至于勒菲弗尔，则因为其提倡翻译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改写（重写）形式及翻译在文学系统中要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而广受注目。他所谓的三种因素指的是：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教师、翻译者自身等；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如当权人士、出版商、政党、学术期刊等；3）经济、地位，主流诗学。他探讨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共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等。

翻译的文化转向被若干学者欢呼为国际翻译研究在西方世界于20世纪90年代的突破性进展，世界各国的翻译研究者纷纷将这一所谓的崭新的观念引入自己的国家，敦促自己的翻译研究同行们快快转向，以便跟上这一历史的大潮流。

但是，且慢。在我看来，“转向”的提法在语义上本属荒唐，前文已经论述过了。现在即使退一万步，姑且认同这一文化转向的提法，那么我要说的是，这一所谓的翻译的文化转向并非是什么新走向，也不是西方翻译界所独有的现象，更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姗姗而来的。恰恰相反，翻译和翻译研究的这种文化走向是古已有之，至少在近现代的中国，它最迟在19世纪末就已经产生，它是

一种相当久远的翻译发展和翻译研究取向模式，在近现代的中国发展得尤其引人注目。

五、中国：100 年前翻译领域的文化取向

如上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翻译界产生了所谓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至多是对西方翻译界而言的转向。对于中国翻译学界而言则不是转向，而是回归，或者说回向。因为早在 100 多年前的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就已经出现大规模的文化翻译热潮及与之并起的热烈地把翻译作为一种整合、改良文化走向的有力工具而加以研究的趋势。

与西方 100 年后才兴起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中国那时的文化翻译和文化翻译研究具有显著的自主特征和理想化特征。请注意，文化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走向是两个不同然而相互联系的概念。在讨论中国的文化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走向时，我们要注意到二者是如何紧密地互根互构在一起的。如果说西方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主要是对已知翻译现象进行研究的话，则中国 100 年前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主要是对理想翻译现象的设计与研究。如果说西方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主张研究已知翻译现象中的所谓操纵行为的话，则中国 100 年前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本身就主张对理想翻译现象进行操纵与设计，那些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强有力的翻译活动模式（包括翻译内容选题、翻译目的、翻译方式等）的操纵者，他们关注的重心不是像西方学者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那样侧重“直译”、“意译”、“可译性”、“不可译性”、“诗体”、“散体”之类命题的讨论，而是更多关注为什么这样译而不那样译、为什么某些国家、某些学科、某些作者、某些作品应该首译或多译或转译或改译或编译等问题。中国这时期的文化翻译工程设计师们往往都是政治界或学术界的巨头，他们影响深远，功勋卓著，在 100 多年前为中国翻译的文化

学派开创了一个罕见的宏阔的发展格局。

事实上,中国近 2000 年来翻译传统的主流都是文化翻译传统而非文学翻译传统。其中,宗教文献的翻译占着相当突出的地位。但是,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文化翻译传统有了一个根本的大变化,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流入。最初是西方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联合翻译基督教文献和科技文献。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徐光启、艾儒略、熊三拔、王徵、李之藻、李经天、邓玉涵等,都曾翻译过颇多西方文化著作,除所谓声光电学数理地图类书籍外,也包括部分经院哲学类书籍。语言文学类书籍则极少,几可略而不提。

1. 洋务派文化翻译对策

可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英帝国主义的枪炮彻底结束了传统中国王朝的闭关自守时代,弱肉强食法则驱使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因此更大规模地引入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翻译界必要的首务。林则徐、魏源等组织的翻译活动体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翻译自主取向:“师夷长技”、“以夷制夷”。1894 年的甲午海战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取向。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尤其是后起的张之洞等人,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旗帜下以鲜明的目的性操纵、设计了当时中国文化翻译的整体格局:自然科学文献翻译为主、社会科学文献翻译为辅。因此,那时的“西学”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类文学,政事方面凡与“中体”不相合者多半不予引进。具有译学馆性质的同文馆(1868)继四夷馆之后成立,与江南制造局(1865)和广学会(1887)一起,构成中国的三大文化翻译重镇。其间的翻译人才及翻译著作,不一缕述。1896 年,通晓希腊文、拉丁文、英文和法文的中国学者马建忠撰写了《拟设翻译书院议》,从中国国家、社会本身的需要考虑,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文化翻译对策:

“曾拟将诸国政教之源流，律例之同异，以及教养之道，制用之经，货财敛散之故，译为一书。……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致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马建忠主张当时的中国应把翻译放在翻译政治、教育、法律、经济、技术类文献上。马建忠还对翻译文献的范围进行了具体规划：“应译之事，拟分三类：其一为各国之时政；外洋诸国内治之政，如上下议院之立言，各国交涉之件……。其二位居官者考订之书：如行政、治军、生财、交邻诸大端所必需者也。……银行体用，方輿集成，凡五洲险要，皆有详图……。其三为外洋学馆应读之书，应次第译成……如万国史乘，历代兴废政教相涉之源，又算法、几何、八线、重学、热、光、声、电、与夫飞、潜、动、植、金、石之学，性理、格致之书皆择其要……派诸生更译。（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9页。）但是，马建忠的这些文化翻译设计蓝图，与洋务派的文化建设蓝图并不一致，清政府并未采纳，所以这些观点主要还是马建忠自己的文化翻译策略和研究心得，在实践中的实现还有待新的社会变迁。此时，洋务派操纵的文化翻译主要落实在器术类文献翻译上。他们一方面大力引入西方的先进器类（如洋枪洋炮洋船之类），同时大力翻译相关文献，训练相关的人才（包括练兵）。开矿建厂之类，也日益兴盛。

2. 维新派的文化翻译策略

然而甲午一战，似乎证明洋务派的文化翻译对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发起者的维新变法自强运动兴起，欲代洋务派而另觅新的发展战略，即文化启蒙战略。启什么蒙？启国人不懂西方文化精粹之蒙。此派以为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避开了关键的政治改革对策。他们试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鼓吹政治改良。而这种改良当以突出介绍、引入“西学”

中的政事类内容为主。如高凤谦就认为洋务派翻译对于“政事之书，鲜有留心，译者亦少。不知中国之患，患在政事不立。”（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1984年，第249页。）梁启超认为甲午之败，败在中国从前只强调船坚炮利，而不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严复亦指责前期洋务派之文化翻译取材未找到泰西强盛的“命脉之所在”（严复：《论世变之亟》）。于是由康、梁掀起的维新变法首次挑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学、西学之战在一个广阔的视野内展开。而这一战主要受制于由维新派设计的文化翻译战略。康、梁所拟定的文化翻译战略主要有三点：第一，最急需翻译的东西是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文化经典。如梁启超所说“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第二，由于变法之急需，故翻译西书的速度越快越好。于是，康、梁二人都力主由日译文转译。原因是国人学习日文比学习西文快，并且日人从明治维新三十年来，“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第三，翻译的内容不要只限于用书籍形式出版，而应尽快见诸报端。并且翻译的内容也不限于经典著作，而可以同时大量翻译最新的各国报章杂志上的文献。这三大战略立竿见影，于是“甲午战后至庚子年间，译书之风大盛，各报馆翻译东西文报纸及书籍者约三十余家。”（同上，马祖毅，第250页。）各类专事翻译的翻译馆、译书局、译书院、官书局、学会（如强学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维新派所翻译的西学，重心在宣传西人的民主学说、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自然科学及方法论等。与同期的西方社会相比，当时中国学界翻译的主要是文化，研究的也是文化。在翻译研究方面，虽然不很系统，但是重心也往往是讨论文化翻译。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例如林纾的翻译）在客观上起到的作用也更多地具有文化启蒙意义，而非艺术价值借鉴。应

该说严复是维新派文化翻译战略的最著名的实践者。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群己权界说》、《社会通论》等，多是当时西方文化的经典著作。严复以提出“信、达、雅”翻译标准知名，他的翻译标准中的达、雅表面上似与语言学派那种“斤斤于字比句次”、执着于文本层面的东西相类，实际上大有区别。例如严复的“雅”力求“汉以前字法句法”，把原作本身的文风完全放在一边，目的只在赢得“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这个读者层（严复：《与梁启超论所译〈原富书〉》），以便获得旧学读者的理解与支持，并进而缩小旧学市场、扩大新学（西学）的影响力。这是一种苦心经营的文化翻译策略。在《名学浅说》序里，他公然说：“盖吾成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为了让读者能够真正明白，他可以抛开原文随着自己的意思发挥。这种“引喻举例多用己意更易”的译法，被贺麟誉为“实在为中国翻译界创一新方法，我们可称之曰‘换例译法’”。（贺麟：《严复的翻译》）这与当代西方勒菲弗尔所提倡的翻译是最为明显的一种改写（重写）形式的说法，是很相通的。只不过严复不仅为这种重写（改写、创造）法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述，还在实践中大规模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总之，严复与其他许多维新派翻译者一样，其翻译活动具有众所周知的文化启蒙目的、其翻译内容的范围、翻译手段、翻译风格都采取了典型的文化战略。

关于维新派文化翻译是一种受到国家机构支持的大型活动，政府方面有许多资助。例如专以译书为务的官书局即可每月获银1000两。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笔可观的数额。

3. 五四西化派的文化翻译策略

五四前后的中国翻译界出现过有关翻译的大辩论，它牵涉到许多学者的翻译观点。胡适、茅盾、郭沫若、傅雷、成仿吾、鲁迅、瞿秋白、林语堂、梁实秋、朱生豪、贺麟、朱光潜、金岳霖……重

要的学者可以列出一大串。这些学者一般都是翻译家兼翻译研究者，而且大多数是西方思想十分浓厚的学者。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无法一一缕述，只能择要讨论一下。仅就翻译研究的文化取向而言，我想鲁迅和瞿秋白是其中最突出的两位学者。翻译在这两位翻译研究学者的眼中，是一种极有效的工具，它至少可以帮助完成四大任务：1) 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2) 改造国民劣根性；3) 毁灭封建传统思想得以容身的媒介；4) 最终帮助完成中国新文化的建设。

关于第一大任务，瞿秋白的论述非常清楚，他认为：“翻译……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因为“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瞿秋白：《再论翻译》）鲁迅则也认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但是他还进一步论证“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中国人的脑筋糊涂、思路不精密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人使用的语言文字本身缺乏精密的语法。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或者医治这个毛病？药方之一就是“通过翻译”，“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鲁迅：《二心集》）这一改造或者说创造中国现代语言的任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用瞿秋白的话来说“是非常重大的任务”。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最核心的成分，因此，鲁迅、瞿秋白这一通过翻译来改造中国语文或者说创造出新的语文的翻译策略，无疑是一个宏伟的文化战略，它远远超出一般的翻译研究的范畴。就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也未能在这点上达到鲁、瞿二人当时的思想高度。

从第二大任务，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翻译的功能还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他试图利用翻译手段来帮助改造他所谓的国民劣根性。鲁迅的逻辑是：中文的不精密的语法导致不精密的思路，不精